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云南教育出版社

云南教育史

主编 蔡寿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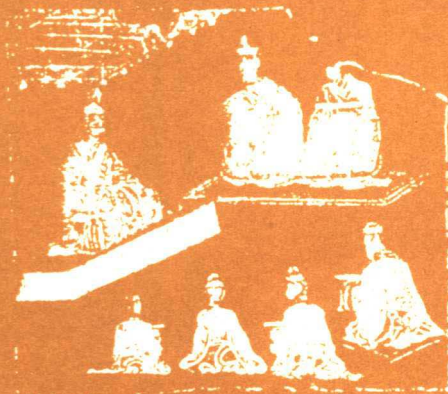
历史教育
中国历史
中国通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现代史
中国革命史
中国思想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艺术史
中国地理史
中国民族史
中国宗教史
中国法律史
中国政治史
中国军事史
中国外交史
中国经济史
中国科技史
中国医药史
中国体育史
中国音乐史
中国舞蹈史
中国戏剧史
中国曲艺史
中国书画史
中国篆刻史
中国陶瓷史
中国建筑史
中国园林史
中国服饰史
中国饮食史
中国医药史
中国体育史
中国音乐史
中国舞蹈史
中国戏剧史
中国曲艺史
中国书画史
中国篆刻史
中国陶瓷史
中国建筑史
中国园林史
中国服饰史
中国饮食史

中国通史

云南教育史

主编 廖世承

云南教育史



主编 蔡寿福
云南教育出版社

A2972/02

38.204
72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教育史/蔡寿福, 陶天麟主编.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6

I. 云… II. ①蔡…②陶… III. 教育史-云南省 IV. G527. 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3434 号

责任编辑: 寒 兵

普家华

特约编辑: 彭书贵

云南教育史

主 编 蔡寿福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照 排 云南文化照排有限公司

印 装 云南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31.25

字 数 780 000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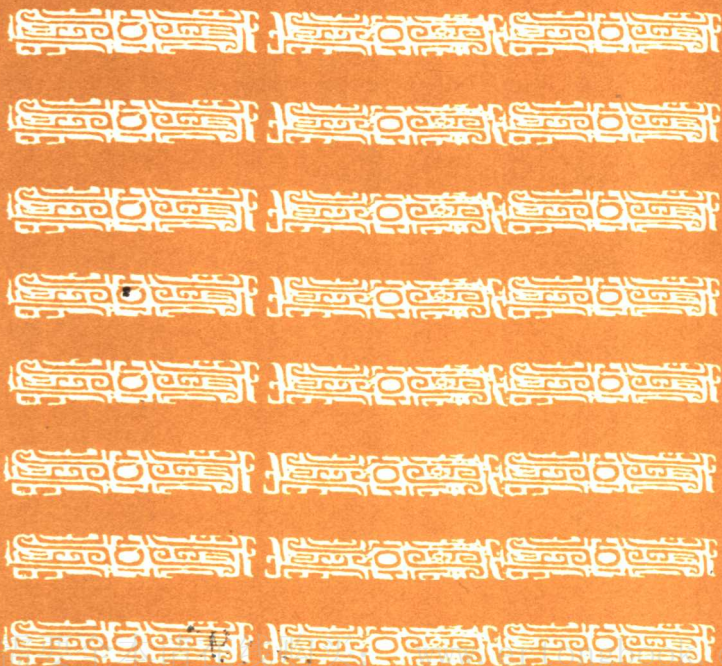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 - 5415 - 1969 - 3/G · 1555

定 价 48.00 元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编委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名誉顾问	何东昌	杨海波	邹时炎	陶西平		
顾问	王显明	王炳照	江 铭	郭福昌	董明传	
	潘懋元	田正平				
主 编	周玉良					
常务副主编	汤世雄	宋恩荣				
副 主 编	马 钊	马文亮	王日新	王可植	王豫生	
	冯象欽	陈乃林	安效珍	宋玉岫	齐红深	
	李喜平	金汉杰	周南照	俞启定	耿 申	
	徐毅鹏	黄定元	韩永久			
编 委	王 悦	王贵福	叶中瑜	孙增福	庄将秋	
	刘先挥	刘锦泉	刘德敏	安永新	张凤民	
	何辅良	李才栋	杨进发	宋良文	苏荣模	
	金宝城	金鱼为	林伯方	孟祥辉	赵 伟	
	赵关忠	赵宝琪	钟 毅	侯金林	姜树卿	
	高 志	高培华	徐 震	徐永富	徐承德	
	秦政奇	唐和亲	符康荣	黄昌明	阎国华	
	曾令兵	韩嘉穗	蒙荫昭	谭 虎	蔡寿福	

云南教育史编委会

主 编 蔡寿福

副主编 陶天麟

编 委 蔡寿福 陶天麟 秦志华 陈天武 温梁华 曾传虎

陶学究 蔡敏慧

著 者 陶天麟 蔡寿福 秦志华 陈天武 温梁华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总序

在这世纪更迭、千年转换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奉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统一规划，按行政区划组织力量开展的大规模的、系统的关于地方教育史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开展，是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初创到发展、兴盛的历程。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清除极左思潮干扰，端正学科研究方向，系统搜集整理积累资料，拓宽研究领域，深入开展专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使中国教育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成为教育科学领域里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门学科。

从以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关于古代教育史的描述，多为汉族聚居，文化发达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历代居于政治中心地带的教育状况。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则

较为注重京、沪、宁与东南一带新教育产生的地区。这种侧重，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因为这些地区一般来说代表了当时全国教育发展的水平与主流。但是，过去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忽视了其他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以及各民族教育交流融合的历史，因此还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如实地反映整个中国教育史的全貌。开展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需对中国教育史的总体发展脉络有宏观上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各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全过程和历史特点以及地域特色。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充实与加强，而不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简单诠释或地区性缩微。其研究的对象、范畴与方法，它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它既要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共性，又要揭示地方教育发展的特殊性与个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地方特色是地方教育史的生命。紧紧抓住“地方”二字，是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关键。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应该是研究教育现象的空间与时间组合的学问。从广义上讲，它应归属于“地域文化”的研究范畴，是介于教育学与地理学、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目前，一些文化学研究者主张，将“地域文化”分为“机能文化区”与“形式文化区”。前者以行政中心的主导与协调功能为标志，后者以“历史文化功能”为标志，即“具有某种文化特征或特殊文化人群”的地域分布。现在我们讨论的地方教育史是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地域范围。但从其教育的演进沿革来看，又不可能离开历史文化的渊源，所以实际上它是兼顾机能文化与历史文化两种区域为范围的。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许多地区来

说，机能文化区域与历史文化区域两者之间又呈现为长期稳定的重叠，是二而一的关系。

研究地方教育史，自然会涉及到各地教育发生、发展与本地区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而影响到人们教育的模式、程度、内容与方法等等。应当承认，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对民俗民风，对人的气质、性格、品味、情趣等的形成以及人才的分布不无关系，这就是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环境同时也影响着一方的文化艺术，诸如自然崇拜、宗教信仰、民居建筑等，这些又都是教育的外部条件。至于人文环境、社会结构对教育的影响，应当说更为直接。诸如区域历史文化变迁中经济的消长，政治的争斗沿革、文化的滋生变异、民族的纷争融合、人口的增减流动、战争的起止等等，可以成为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制约条件，影响着教育的内容、方针与方法。同时学派与学术思想的地域性分布，更是直接作用于教育。如先秦时期儒、墨以鲁国为中心，而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楚、秦发展。道家源于楚、陈、宋而流入齐，法家始自三晋等等。北宋、南宋时期的关学、洛学、濂学、闽学、婺学、陆学、湖湘学等都呈现出地域性特点。这些学派的相对集中与士人设学授徒传播教化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地方教育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范围的“机能文化区”教育史，不同于纯粹的“形式文化区域”教育史，其运作机制主要由区划中心进行指导与调节。但是文化的传统，与环境、与教育的发展模式、发展规模、发展速度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联，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关注本省、区、市历史上的文化传承演变过程。只

有准确地把握本地区历史文化的脉络，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本地区教育发展的特色。

亚洲东部这块辽阔的土地是中华民族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家园，自西向东依次递降的海拔落差与由北向南的纬度变化，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这不同的生态环境也成为影响人文发展的重要因素。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区域。

根据对各省区考古发现的 7 000 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其后种种历史资料的考察，可以证明在公元前 6 000 年至前 2 000 年间的文明曙光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分散聚居的各个地区，已分别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多元性区域文化。如以渭、汾、洛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文化区，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文化区，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文化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文化区，以及辽东、辽西、燕山地区的燕辽文化区，鄱阳湖——珠江三角洲的华南文化区，黄河上游的甘、青文化区，北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等等。而且这些不同区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或迁播扩大，或分化重组，又演变成新的文化区域。如后来的三秦文化区、齐鲁文化区、中州文化区、荆楚文化区、三晋文化区、燕赵文化区、关东文化区、吴越文化区、徽州文化区、巴蜀文化区、滇云文化区、黔贵文化区、八桂文化区、八闽文化区、岭南文化区、陇右文化区、草原文化区等等。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间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地相互摩擦、交流、渗透、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总格局。这种种演变又直接影响到相互间的交通、人口迁徙，逐渐形成了长期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今天的行政区划是由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与相对稳定的文化系统演变而成，虽不完全对应于古代的历史文化区域，但文

化的承袭与曾经所属的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追寻教育的历史轨迹所不能忽视的。

研究地方教育史，在考察本地区过往文化走向与教育走向之间的继承演化关系的同时，也还需注意考察本区内不同地区间教育发展水平的升沉消长，进行区内的比较研究。也需注意与同时代其他地区，与全国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总结出本地区的教育特点。

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避难、军队戍边、政治变乱、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曾经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和民族迁徙。这些都对文化的交流重组、教育的兴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从东汉末年到两宋之际，游牧民族入据中原，先后形成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大批中原人民的南迁，在给南方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与中原文化。除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外，还有历代因罪而被谪贬的官员士人的零星流放迁移。他们中有许多谙习儒家经典的人才，南来之后无论著书立说，还是教学授徒，都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教育与文化习俗。如东汉末年，会稽大儒虞翻因直言获罪，被贬交州（今广东、广西）。但他“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又如柳宗元，“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又迁为柳州刺史。他雄心不减，兴建州学与孔庙，重振文教事业，不仅对广西教育，而且对其他地区的教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来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迫使中国教育大规模西迁，使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蒙受了巨大的破坏，延缓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从另一方面看，众多文化精英在短期内迅速地向西南地区、西北地区聚集，形成了战时内地文化教育在边远地区形成中心，既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新思想，

丰厚的人文精神充盈到这块偏僻的土地，又为战后教育与文化的复兴保存了民族的命脉。这些可在抗战时期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的教育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一年前，江泽民同志在给白寿彝先生的信中指出，“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痛苦。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江泽民的信，指明了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我们在《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开题时的《研究方案》中，就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本项研究的如下指导思想：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为指导。在近年来地方志、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掘地方教育史的资料，对各地教育发展的历史加以科学地梳理与分析，实事求是地记述地方教育发展的史实，客观地分析与总结其特点与规律。通过研究，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教育发展的丰富而多样的全貌。通过这一研究，为当前的教育改革与未来的教育发展提供决策的依据。

各地地方教育史研究多是在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二者都以“地方教育”为研究对象，但由于研究的目的与关注的重点不同，决定了志与史两者体例上的差异。一般说来，志书，是记述之书，以存史备考为要，只需客观记述，记述者述而不作，无需加以议论分析；而史书是撰述之书，既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还需揭示历史本质，分析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经验，评论利弊得失，作出价值判断。它与地方教育志研究相比，地方教育史研究更多地体现出研究者

的主体性因素。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更加充分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实证史学的方法，注重证据实证，重视逻辑，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并不断地加强对新知识新方法的学习与运用。只有这样，才可能追随学术的前沿，阐发历史的精义，提供历史的借鉴。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世纪转换与千年过渡时期立项、开题、完成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试图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出时代的精神。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个时代历史学的研究，都会深深地刻上时代的印记。历史科学的认识过程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时代精神都会在历史认识的观点、视野、视角、方法等方面得到及时的敏锐的反映。经历了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史学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研究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了一些新的澄清、新的结论、新的认识、新的评判。过去那种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已得到很大改观，所谓的“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卖国”简单化表层化的评判方式，那种以政治标准代替学术标准的治学模式，虽未绝迹，但已渐被人们舍弃。当新的史料不断被发现，日渐丰富充实；当中国越来越快地，越来越大幅度地走入世界，社会环境与社会心理都日渐发生变化；当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一种更为广阔的胸襟，更为客观冷静开放包容的眼光，更加高屋建瓴地来审视过往的历史。我们紧紧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努力在地方教育史的原野上开辟出一片绿洲，结出累累果实。我们相信，通过展现地方教育史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全

貌与总体的认识。同时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者的论调，也是一种有力的鞭挞。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开展，可能会对人们认识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一些思考与借鉴。

一部部各具地方特色的地方教育史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版，为整个中国教育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使我们认识到，忽视对地方教育史的研究，中国教育史发展过程的记述与教育发展规律的总结，是不完备的。中华民族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统一整体。这个统一的整体，正是通过各具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的地方教育，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以普遍性为参照系探寻特殊化，通过特殊性验证普遍性，二者之间的相互比较与印证，将有助于更加科学、全面、深入、准确地总结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及经验教训。

中华民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教育曾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认真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高全社会对教育的认识，切切实实地促进教育的发展，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有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造就一代新人，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这一课题，是由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牵头，组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大协作下进行的。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于1986年成立之初，即以“推动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与交流”为职志。十多年来，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此的研究人员，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教育行

政部门领导同志的关心与支持。正是这些关心和支持，才使地方教育史志的研究有了组织上、人力上、物质经费上的种种保障。同时也得到了各地有关研究人员的积极合作。是他们在社会风气偏于浮躁、急功近利的情势下，仍能不计清贫与寂寞，甘坐冷板凳，在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孜孜以求，才有了一部部地方教育史著作相继问世。教育部下属的全国教育科学领导小组教育史学科组的专家，以及各地区有关的学者，始终关心着本课题的进展，随时给予指导，热情参与审稿评稿，严格把关，对提高编写人员的水平，保证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是，由于是大规模组织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受研究资料、研究队伍现状以及各地某些实际条件的限制，这一研究成果，还存在着种种问题与不足，也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我们期待着学术界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编委会

绪 论

云南，简称“滇”，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位于东经 97°31'39"至 106°11'47"和北纬 21°8'32"至 29°15'8"之间。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通向中南半岛和南亚各国、进而走向世界的陆上交通要道。全省辖 16 个地、州、市、128 个县（市、区），省会是昆明。总人口近 4 200 万，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数的 1/3；有 51 个少数民族生活在云南，其中人口在 5 000 人以上的有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壮族、苗族、傈僳族、回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景颇族、藏族、布朗族、布依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蒙古族、水族、满族、独龙族等 25 个，除藏族、蒙古族、回族、苗族、瑶族等族进入云南的时间较晚之外，其他少数民族都是云南境内世居居民。明朝后，汉族人口才在数量上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因此，云南自古就是集边疆、山区、少数民族三位一体的省份。它东西横贯 864.9km，南北纵跨 990km，国土面积为 39.4 万 km²。西部、南部与缅甸、老挝、越南 3 国交界。国境线长达 4 060 km；东面和北面与祖国的广西、贵州、四川、西藏 4 省区接壤。云南属高原地区，南邻中南半岛，处在太平洋东南季风和